

钟情书院谱新篇 ——评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

刘 海 峰

(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作为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书院历史的学术专著, 邓洪波教授撰写的《中国书院史》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分析细致、注重实证, 不仅充分体现出作者超越前人的构思和用心, 而且显示出了相当的深度和厚度。尽管如此, 《中国书院史》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关键词〕《中国书院史》; 书院; 书评

〔中图分类号〕G649. 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05)03-0070-04

由于总是不断有一些非完成不可的任务, 近年来我已很难有时间来写书评类文章了。但是, 《大学教育科学》编辑部向我约写邓洪波教授所著《中国书院史》的书评^[1], 我却勉为其难, 恭敬从命。个中原由有三: 其一是因为此书的由来与我有关。1996年, 东方出版中心张爱民编辑约请我撰写《中国科举史》一书, 并征求我推荐其他有关中国文化史领域的合适选题和作者人选, 我惟一推荐的便是《中国书院史》, 而我认为最适合撰写此书的便是年富力强的邓洪波教授。其二是因为我对书院研究也有相当的兴趣, 也曾发表过数篇关于书院研究的论文, 有一些想法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出来。其三是因为自己是湖南大学的兼职教授, 又忝列《大学教育科学》的编委, 为其写一篇文稿是理所当然的事。

以往邓洪波教授所出的不少著作多为合作署名之成果, 本书似乎是他第一本个人学术专著, 600余页, 51万字, 相当厚实。这是一本研究性的专题史, 凝集了作者20多年书院研究的心得, 是在进行许多专题研究和发表大量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 是将其学术观点集大成的著作, 其分量与那种缺少前期研究成果的著作当然有所不同。初读之后, 对该书有以下几个印象。

一、内容丰富

在一定意义上, 一部完整的专题史可能比一部学术专门论著更不容易写好。写一般的学术论著,

可以根据论题需要或作者的兴趣扬长避短或避重就轻。但写一部完整的专题史著作, 则不能有重要的遗漏, 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 即使对你不熟悉或不感兴趣的部分, 也不能跳过去。加上现在很少有什么专题史研究是前无古人的, 为了避免与已有的同类著作重复或雷同, 总要别出心裁, 有所创新, 其篇章结构和写作手法便颇费周章。《中国书院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书院历史的学术专著, 它以书院的发展历程为主线, 深入阐述书院的发展脉络和内在动因, 强调书院的文化性、阶段性, 并注意各个时期书院的典型介绍, 点、线、面有机地结合, 力求反映书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以及书院在近代西学加盟后的变革。全书内容丰富, 观点鲜明, 充分体现出作者超越前人的构思和用心。

该书对书院的起源和书院的初始形态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 对其分布特点、功能形态、教学功能、建设特点等——条分缕析。对北宋官学运动与书院的流变、理学家与南宋书院运动的兴起、书院制度的确立、元代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明代书院的繁荣与辉煌、清代书院的普及与流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作者尽量吸收自己和其他学者的书院研究成果, 使该书的论述相当全面且起点较高。在把握宏观格局的情况下, 也有许多细致的叙述。例如, 作者认为南宋理学家大多有很深的书院情结, 并以朱熹为最。作者指出朱熹痴迷白鹿洞书院已到了失常的地步, 例如, 朱熹为了修建书院礼殿, 置备田

^{*} 〔收稿日期〕2005-04-01

〔作者简介〕刘海峰(1959-), 男, 史学博士, 厦门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考试制度研究。

产,竟然利用他任浙东常平茶盐提举使的职权,挪用浙东30万缗赈灾救灾款。这是一个明显违规而又非常严重的错误,朱熹也因此事受到监察御史的发查办(144页)。

作者一贯强调书院学田的重要性,认为学田与讲学、藏书、祭祀一起成为北宋书院的四大基本规制。中国士人自古即多贫寒,虽号称“四民之首”,但农工商各有常业,而惟士无恒产。许多书院山长都认识到:“院有田则士集,而讲道千载一时,院无田则士难久集,院随以废,如何讲道哉?”也就是说,学田是书院其他各项事业的前提与保证,“书院不可无田,无田是无书院也”(李东阳:《白鹿洞书院新志》卷6,《白鹿洞学田记》)。将学田视为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作者对学田特别关注。作者认为,到南宋时期,学田也应与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一起列为书院的六大事业(160页)。

清代中后期,书院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不仅数量众多、层次分明,而且范围广泛、影响深远。书中对清代书院的论述尤为周详,特别是对省会书院和包括台湾在内的边疆地区书院都有专门的论述。在一千多年的书院史上,书院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到清末,书院实际上已变成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概念。作者指出,西学东渐之时,来华的外国人将其创立的School、College、Institute、University、Academy等文化教育机构都叫做书院,而且,走向世界的中国士人也将他们在西方见到的近代学堂、学校、图书馆、实验室,甚至科学博物馆、展览馆等都称作“书院”,介绍给国人。书院作为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不仅为中国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作出了贡献,而且也有助于中西文化交流,而教会书院便是这种交流的产物。书中对教会书院特别着力加以论述,作者尽力考证出97所教会书院并列表介绍,分析了教会书院的发展历程和阶段性特征以及教会书院的影响。

该书名为《中国书院史》,实际上兼及域外书院,如韩国、日本的书院,乃至西洋和南洋的书院。以往大陆的学者对海外书院的了解较少,而该书对朝鲜移植书院制度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对朱熹及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中朝书院的异同作了专门的介绍。对日本的书院,以及意大利、美国的书院、以新加坡萃英书院为代表的东南亚华侨书院都有独到的论述。对中国学者而言,这部分内容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二、分析细致

《中国书院史》是一部研究性质的专题史著作,许多内容显示出作者的学术观点,在能展示其见解的部分,作者的分析尤其细致。例如,对唐代集贤书院的考释,对有关书院的唐诗的分析,皆相当周详,对相关资料几乎是细大不捐。对北宋天下“四大书院”和“三书院”的辨析,也是不厌其烦,将各种说法一一排列组合,细加比较,读者从中可以全面了解各种观点的来龙去脉和异同出入,是至今为止对北宋四大书院辨析最为详尽者。

在相当一段时期,学术界流行着书院具有反科举或不重视科学的特点等观点,好像要赞扬书院,就要高扬反科举的旗帜,与科举划清界限。其实,在20世纪初,书院与科举类似,都被视为落后的东西或旧学的堡垒,于是才有改书院为学堂的举措。当书院被平反之后,许多人对科举的认识却还停留在清朝末年的阶段,而当时对科举的激愤言论往往是以偏概全的。《中国书院史》一书不再忌讳书院与科举的密切关系,不再对大量相关史料视而不见或不屑一顾,而是善于吸收各种新的学术观点,不再停留在书院反科举的传统说法上,在许多章节中反映出书院与科举的密切关系。作者认为,书院与科举结合,是强化其教育功能的最大表征。民间书院以读书应试而扬名者不少,如笙竹书院因冯京、郑獬二人前后双双高中状元而成为科举圣地;黄氏书院学生宋庠(郊)、宋祁兄弟在天圣二年(1024年)同登进士,而且宋庠还是状元及第。书院与科举功名一经联系,其名声也就流传久远。著名的应天府书院学生累捷于科场,曾主持书院教学两年的范仲淹在作《南京书院题名记》时,其所津津乐道者也就是科场题名,赞赏魁甲英雄,主张教育学生的书院与录取进士的科举相结合(77~80页)。

同时,该书也深入地分析了书院大师对“科举俗学”的批判。针对士子“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朱熹:《晦庵集》卷80,《信州州学大成殿记》)的积弊,朱熹等南宋理学家提倡不以科举为主要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他曾对岳麓书院学生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之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朱子语类》卷106,《外任·潭州》)但朱熹也明白,在科举时代,任何反对科举的教育机构要想长久存在,尤其是想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几乎不可能。因此,朱熹等理学家们接受这无可奈何的现实,并不泛言

反对科举,只是将反对的目标锁定在仅仅以科举为目的这一点上,而将大量的精力倾注于讲学事业。陆九渊也提倡书院诸生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陆九渊:《白鹿书堂讲义》)。南宋前期学者,不分派系,无论朱陆,在对待科举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皆认为“今为士固不能免此”,又对其弊端深恶痛绝,而希望以“讲学”来予以救正。作者还特别请李兵博士撰写了书院与乾嘉汉学、清代书院与科举两节,更为细致地分析了书院与科举的矛盾互动关系。

《中国书院史》一书还纠正了不少以往研究的偏差。例如,作者一再强调书院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与教学不能涵盖书院的所有功能,更不能无限度地强调这种功能。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读书人在其中开展藏书、读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着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事业。从整体上讲,书院的教育功能源于文化传播,服务于文化积累、研究与创造。或者说,书院教学是文化积累、研究创造基础之上形成的文化知识的传播形式之一,是文化发展链的一个环节。这种功能的重要性以及其他功能的难于表现而具有后台性,都使得我们有可能只看到前台的教学活动,而忽视其他功能的存在(58页)。因此,作者不是就书院而论书院,而是尽量将书院放在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下展开论述,探究书院与中国古代学术、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因而显示出相当的深度和厚度。

三、注重实证

以大量的图表来说明问题、注重实证分析是《中国书院史》的一个特点。对各个朝代书院的地理分布、各代不同皇帝在位期间新建或重建书院数量的变化等都尽量列表或画图,同时还列出各代书院发展轨迹参考图,给读者以直观的介绍。

另外,书中还编列了各种各样的图表,其中篇幅较大的如《明代编刻书院文献一览表》、《朱熹在朝鲜书院中享祀情况一览表》、《万历禁毁书院情况一览表》、《清代还古书院递年讲学会纪一览表》、《康熙年间赐额书院一览表》、《清代台湾书院一览表》、《清代部分省会书院招生人数统计表》、《日本学校性质的书院情况一览表》、《中国教会书院一览表》、《湖南书院改制一览表》等,皆颇有价值,可以看出作者为编

列这些统计表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众所周知,统计分析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只是要求作者能够细心踏实地坐冷板凳。邓洪波教授多年来倾心研究书院史,可谓朝斯夕斯孜孜焉梦寐以求,于今终于修成正果,拿出这本颇具分量的著作来,而书中的统计图表便是全书中分量最重的部分。

作者长年浸润于岳麓书院的地气和氛围之中,受书院文化的熏陶濡染甚深。但板凳学问与行走学术两者应该兼具,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据我所知,作者曾考察过大量的书院或书院遗址,这对真正深入理解书院史大有益处。作者不仅对湖南、江西两个书院大省的书院遗址作过详细的考察,而且对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全国许多省区的书院,甚至日本、马来西亚等地的主要书院都作过实地考察。大凡进行过实地调查的学者都知道其中的艰辛。1990年9月,我与李才栋先生在安徽芜湖参加“中国考试史资料选编研讨会”,会后到九华山游览。我们对那些众多的佛教寺庙没有兴趣,因此两人离开会议代表队伍,单独寻访甘泉书院遗址。那天正好下着大雨,我们登上高高的石阶,最后好不容易爬到书院遗址时,看到的只是鞠为茂草的一块平地,所幸我们拨开茅草,发现一泓清泉上方的一块巨石上刻着遒劲大方的“甘泉石”三个字,证明这里确实是明代甘泉书院的遗址。这只是我亲历的对一个书院遗址考察的事例,要对海内外多数主要书院作考察,可想而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但是亲眼见过书院的建筑和周遭的环境之后,对该书院的理解自然会更深一层。由于邓洪波教授对许多书院都有了感性认识,在《中国书院史》一书中体现出更深的理性认识。

学术研究既要冷静客观,以理性的态度直面研究对象,但我认为也要有一定的激情。有激情者往往较易闪现灵感和思想火花,因此我主张治学、写作应“让思想在脑际上行走,让激情在弦上行走,让笔尖在稿纸上行走,让指尖在键盘上行走”^[21]。邓洪波教授对书院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在书中多有体现。例如,在谈及1901年诏令改全国书院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时,作者的表述为:“犹如一把利刃,活活斩杀了大发展中的书院,人为地制造了中国制度史上罕见的落幕于辉煌的悲剧。虽然,书院改学堂接通了中国古代与近现代教育的血脉,我们可以说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但毕竟杀身成仁、立地成佛的顷刻之变,实在有太多的问题可以讨论。”(447页)从该书的行文中,体现出作者是带着惋惜的心情来看待书院改学堂之举的。对研究对象怀有感情,便

会投注大量的心血,使视觉和触觉更为敏锐,使研究成果更有深度、更有价值。

从宏观上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与书院是一对难兄难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当时,科举被许多进步人士看成是落后的东西,书院则是旧学的堡垒。因此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上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便指出:“成事必先正名,三代皆名学校,宋人始有书院之名……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姓名以希图膏奖,不守规矩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2)与科举考试内容改为西学仍不能根本改变科举制的强大惯性类似,从学习内容上进行局部更新,也没能够彻底改变书院以传统学问为主的性质,结果无法逃避被革命的结局。只是邓教授认为改书院为学堂并不完全是书院命运的终结,全书最后结尾一句文字为:“这么多书院进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教育生活,从一个侧面再一次证明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

因此,《中国书院史》一书定性 with 定量研究结合,在实证的基础上发表论点,既用大量的史实和图表冷静地呈现书院发展的概貌,也以流畅的文字和包含深情的笔锋描述书院的特点和精神,是中国书院史研究的一部优秀之作。

四、几点商榷

依我个人之见,《中国书院史》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在此提出几点,以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向来地方志对记载本地的科名和书院通常是多多益善,而清代地方志记载唐代历史的可信程度值得推敲。清代史学家徐松曾指出:“图经、家乘,例载科目,而近世府州县志袭谬承讹,动遭指摘。”^[3]因此他在编纂《登科记考》一书时只采用《永乐大典》所引的宋元旧籍,其余未加采信。我在撰写《福建教育史》一书时,便看出福建地方志所记唐代科名就有许多附会或谬误的成分^[4]。唐代漳州的“松洲书院”到底是陈珣当时所创设,还是后人对他主办的乡校或别业的称呼,我觉得还值得斟酌。并不是所有地方志记载的唐代书院都可采信,由此对唐前期年平均书院数的计算也就值得掂量。我认为,在书院的萌芽阶段,可能很难像后来那样按年平均来计算,较少可比性。

作者从事书院研究多年产生了感情,对岳麓书

院又情有独钟,可能有一点“岳麓书院情结”。作者在书中多次谈到岳麓书院为北宋“天下书院之首”。在北宋时期,岳麓书院确实是四大书院之一,但主要凭几种“四书院”的提法中都有岳麓这一点,是否就合适冠以“天下书院之首”,我觉得还可考虑。即使是作者持这种观点,似乎也不宜用“号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101页)的提法。例如,在南宋部分,该书并没有将白鹿洞书院称之为“天下书院之首”,而实际上白鹿洞书院在南宋的影响和地位比岳麓书院在北宋的影响和地位更大更高。并且,从五代、两宋直到明代,江西省的书院数总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成为“书院发生原动力的所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白鹿洞书院的长久影响。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史上并峙的双峰,各有千秋,各个时期的影响又有所不同。对这一点,现代湖南的学者与江西的学者往往观点不一、厚此薄彼,而作为总结性的中国书院通史著作,则应该更为平衡客观。

还有,作者实际上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自己曾编出200余万字的《中国书院史资料》三册。但在《中国书院史》一书中,相当多的史料在注明原料出处之后,又再注明“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某某页”,反而变成引用二手资料,实为多此一举。特别是有时在引用朱熹《招举人入书院状》等史料,不是注明很容易查找的原始出处,而是注引该资料书(133~134页),则与学术专著的习惯不符。将来如若再版,可以考虑调整改进。

“科第当作状元,仕官当作宰相,学术当至圣人,言皆当第一也”(姚勉:《雪坡集》卷46,《正谊书院祭魁星》)。这是南宋时状元姚勉当官之后,在正谊书院和西涧书院祭奠魁星、勉励院中诸生的最高期望。而即使在科举时代,要实现此目标也是异常困难的。于今我们从事学术生涯的人,大概没有人敢说想成为“圣人”了,但目标定得远大一些,“为官须作相,及第早争先”,在同行中力争上游,止于至善,还是应该鼓励的。邓洪波教授这部新著已经将中国书院史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只要他继续孜孜矻矻,乐此不疲,相信一定还会做出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 [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 [2] 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5.
- [3] 徐松.登科记考·凡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4:2.
- [4] 刘海峰,庄明水.福建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21.